

教宗方濟各與教會的改革

劉賽眉

[摘要] 教宗方濟各自2013年3月就任教宗之職開始，便積極以梵二大公會議的精神推動教會的改革。教宗本人並未曾出席和參予過梵二大公會議，那麼，梵二的精神是如何融匯並進入他的生命和行動之中？文中指出這與拉丁美洲的主教團(CELAM)會議有關，尤其是2007年在巴西阿帕雷西達(Aparecida)所召開的會議，他是這個會議的文件的負責人，在他成為教宗之後的第一個宗座勸諭《福音的喜樂》中，曾多處引用這個文件的內容。除了梵二的精神以外，教宗自己的教會觀、靈修觀、生活背景、個人風格等，都影響著他的改革路線和方向。教宗視教會為「在旅途中的天主子民」，以及「慈悲的母親」，他的教會觀是他改革行動的理論基礎。教宗所推動的教會改革，集中在三方面：心態上、架構上、和牧民上。而改革的目的，是要使到教會重新充滿傳教活力、滿溢福音的喜樂。他十分強調「慈悲」和「貧窮」，他盼望透過具體的改革行動，教會能夠成為一個「為窮人的貧窮教會」，充滿慈悲和寬恕。教宗的改革並非一帆風順，其中也遇上不少挑戰和困難。

Abstract: Pope Francis has wanted to reform the Chur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Vatican II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is papacy, even though he did not personally participate in the Council.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meetings of the Bishops' Conference in Latin America (CELAM) had a great impact on him in terms of the proper reception of the teachings of the Council, especially the Aparecida meeting in 2007. Francis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drafting the final document of the Aparecida meeting. He repeatedly refers to this document in his 2013 Apostolic Exhortation *Evangelii Gaudium* (EG). This article also highlights several factors which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character of his reforms, including his ecclesiology, his spirituality and his personality. The “Pilgrim people of God” and “merciful mother” are the Pope’s favorite images describing the nature of the Church, which also provide the theological foundation of his reforms. Pope Francis advocates reforms of the Church, focusing on three aspects, that is, mentality, ecclesiastical structures, and pastoral directions. The main goal of the reforms is to revitalize the missionary zeal of the Church and to rejuvenate her in the joy of the Gospel. Francis highlights the themes of “mercy” and “poverty.” The Church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poor Church for the poor,” full of mercy and the forgiving love of God. The Pope’s reforms are, nevertheless, quite challenging, sometimes even facing unimaginable obstacles and criticisms.

導言

根據 Walter Kasper 在 *Pope Francis' Revolution of Tenderness and Love*¹ 一書中的看法，自教宗本篤十六世採取辭職的勇敢行為那一天開始，一個新的紀元便降臨到教會身上，這個「新」的時代是如此之獨特，以致於無人可準確地預料到將會發生甚麼。這個新時代的來臨，正值教會處於最混亂和痛楚的邊沿：先是教宗的文件被盜取，梵蒂岡機密外洩；接著是多個地方變童和性侵事件的揭發…。教會在意識形態上所面臨的挑戰，已經不再是古老的共產和無神主義，而是由全球化所產生的種種挑戰，例如：消費主義、拜金主義，一切以經濟為目的，人變為達至經濟目標的工具。教會盼望站在世界和人群中，但卻被邊緣化。

教會就是在這樣的氣候下，並在聖神的蔭護中，一位來自拉丁美洲的新教宗為我們誕生了。這個教宗從一開始便給全球天主教徒帶來許多「新」的現象，他在就職之初的種種表現和行動，都給我們不少「驚訝」，因此有人稱他為“Pope of Surprises”，² 不論信徒是否同意他的做法和說法。有一點很清楚：他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領袖，他敢於打破傳統。就由於他身上那種獨特不凡的風格，為他贏來不少積極的讚許，亦同時帶來許多消極的批評。

1 Walter Kasper, *Pope Francis' Revolution of Tenderness and Love*, trans. William Madges (New York/Mahwah, NJ: Paulist Press, 2015), pp. 1-10.

2 Ibid.

對於教會，他一開始便渴望以梵二的精神去進行改革，他極希望教會重新充滿傳教活力，是一個滿溢福音喜樂的團體。這一點在他由 2013 至 2018 年所頒佈的宗座文告中表露無遺。例如：在 2018 年 9 月 26 日《教宗方濟各致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文告》裡，他引用《你們要歡喜踴躍》宗座勸諭 (*Gaudete et Exsultate*)，³ 再次表達他對教會的願望，他說：教會需要的不是官僚和公務人員，而是熱心的傳教士；又說：「我們要捨棄死氣沉沉、冷漠麻木的庸碌生活…，教會不可疲憊無力，要勇往直前去擁抱主帶來的驚喜。」⁴

本文的重點是從神學角度去看教宗方濟各與教會的改革。教宗方濟各並沒有出席過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然而，在他的領導下，梵二的精神是以一種嶄新的方式在教會內實踐出來。梵二的精神是如何融匯並進入他的生命和行動中？那麼，我們不得不追溯到與拉丁美洲主教團會議的關係。事實上，除了梵二精神的影響以外，他對教會的神學視野（即他的教會觀）、他的靈修、生活背景、個人的魅力與風格…等等，都是塑造成他的改革路向的重要因素。在此，我們且簡作探討。

梵二、拉丁美洲主教團 (CELAM) 會議與方濟各

談到梵二精神對方濟各的影響，我們必需追溯到拉丁美洲主教團的幾次重要會議。

3 教宗方濟各，《你們要歡喜踴躍》宗座勸諭，2013，138號。

4 《你們要歡喜踴躍》宗座勸諭，139號。

在梵二結束以前，拉丁美洲主教團已感覺到要聚集一起，考慮如何把梵二的思想落實在自己的處境中。拉丁美洲主教團於1955年成立。1968年在哥倫比亞的麥德林 (Medellin) 召開會議，頒發了一份文件：The Church in the Present Day Transformation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Light of the Council。此文件強調的重點是：重視窮人和邊沿人士；「解放」一詞首次出現在教會的官方文件；基基團在此會議之後大為推廣。1979年在布培拉 (Puebla)，這主教團又舉行會議，反思的主題是：The Present and Future Evangelization of America，明顯選擇與窮人站在一起，並再一次肯定基基團。1992年，在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會議中討論了「新福傳」。

2007年，在巴西的阿帕雷西達 (Aparecida) 的會議主題是：Missionary Disciples of Jesus。這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主教團第五屆全體大會。當時，方濟各被推舉為編寫大會最後文件小組的主席，負責起草《阿帕雷西達文件》。這份文件對方濟各有深遠影響，在他成為教宗之後所頒發的宗座文告中，多次找到這文件的影子，譬如：《福音的喜樂》(Evangeliij Gaudium)⁵ 便多處引徵這文件的思想。

2013年10月份，在 *America* 雜誌刊載了一篇由耶穌會神父 Ernesto Cavassa 所寫的文章，名為：“On the Trail of Aparecida: Jorge Bergoglio and the

5 中譯名字取自《福音的喜樂》中譯本，簡稱EG。

Latin American Ecclesial Tradition”⁶，作者分析，這文件至少有三點影響了教宗方濟各。首先是「為窮人的貧窮教會」，優先關愛窮人（preferential option for the poor）不只是拉丁美洲教會的事，而是整個教會的方向，這是一個 non-optional option，選擇與窮人站在一起，不僅是指教會的慈善工作首先指向窮人，同時，是要求整個教會在建制上、管理上都以此選擇為優先。其次是「基督是中心」，即呼籲個人與基督相遇，成為祂的門徒。第三是「走向邊沿」，不只是地理上，更是存在性的，指走向那些悲慘的處境。

方濟各的神學視野

若要了解方濟各的改革路向，則必需先明白他的神學視野，尤其是他的教會觀。他對教會的看法，深受阿根廷的本地神學影響，這個神學雖誕生於阿根廷，但具有普世性的幅度。這個神學稱之為「人民神學」(Theology of the People)。在此，且作簡略介紹。

1 人民神學

阿根廷主教們期望回應梵二大公會議的精神，特別突出四點作為當地教會改革的焦點，即：1) 在心態上——自我覺醒；2) 教會在管理和制度上真正地革新；3) 與其他基督教徒交談；4) 對今日世界開放。

6 Ernesto Cavassa, “On the Trail of Aparecida: Jorge Bergoglio and the Latin America,” *America*, Oct 30, 2013. <https://www.americamagazine.org/trail-aparecida>

人民神學源自阿根廷，這神學可以說是當地教會改革的理論基礎⁷。而教宗方濟各的改革思想，亦受到這個神學的洗禮。人民神學又可稱之為「阿根廷式的解放神學」，這個神學得以在阿根廷生根，有賴一群本地神學家的努力，其中 Lucio Gera 是一位關鍵性人物，方濟各對他很尊重。

人民神學不同於其他南美的解放神學，在方法上，它不是從社會和政治的實際處境出發，或以馬克思的思想範疇來作神學解釋。它是從人民的歷史環境和文化作分析，而這些人民是藉著一種精神和文化氣質所凝聚在一起，這個神學不是去指導人民，而是去「聆聽」人民的智慧，對人民的民間宗教虔誠（民間熱誠敬禮）非常重視，它並非忽視社會的矛盾與對立，只是不以「階級」對立的思想來面對。反而，這個神學所強調的是：和諧、和平、修好。

阿根廷的人民神學，深受歐洲思想所影響，阿根廷的神學家都曾在歐洲受訓，尤其是德國、法國等地。譬如：Lucio Gera 的教會觀，就曾受十九世紀的都平根學派 (Tübingen school) 所影響，特別是梅勒 (John Adam Möhler 1796-1838)。因此，阿根廷的人民神學，可置於國際和普世教會的脈絡中來了解。

7 有關人民神學的詳細內容，可參考：Rafael Luciani, *Pope Francis and the Theology of the People*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17).

教宗方濟各是來自拉丁美洲，他做神學反省的方法，多少是受到當地神學的方法論所影響，概括而言，就是：see, judge, act 三步曲。⁸ 他的神學思維，帶有濃厚的牧民和宣講的色彩，所以，有人稱他的神學為「講道神學」（kerygmatic theology）。

2 旅途子民的教會觀

教宗方濟各曾用多個圖像 (images) 去描寫教會，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兩大圖像：「教會是旅途的子民」和「教會是慈悲的母親」。現在讓我們先看看第一個圖像：教會是旅途的天主子民。

從某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方濟各的人民神學教會觀，是受到梵二大公會議的思想所塑造，尤其是《教會憲章》（論天主的子民，LG 9-17）與《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討論教會與文化的關係，GS 53-62）。此外，教宗保祿六世 1975 年的宗座勸諭《在新世界中傳福音》，也是有利的因素。在所有的前任教宗中，教宗保祿六世的思想最影響方濟各，尤其是這三個文憲，即是：《祂的教會》（*Ecclesiam Suam* 1964）；《民族發展》（*Populorum Progressio* 1967）；《八十週年》（*Octogesima Adveniens* 1971）。以上的文件都曾多次

8 See, judge, act 三步曲源自比利時 Cardinal Joseph Cardijn(1882-1967)，他非常關心工人及貧窮階層，為他們爭取權益。在成立天主教青年工人運動（Young Christian Workers, YCW）時採用該社會分析和信仰反省方法。這方法影響了世界各地的基督徒社會運動，包括北美洲及南美洲的教會團體。它在南美被採用時，與解放神學運動兼容。

在《福音的喜樂》中被引用。⁹

在教宗方濟各的教會觀中，「天主子民」的圖像佔中心地位，這個教會的圖像在《福音的喜樂》中被教宗大量應用，尤其在 111-114 節。為方濟各而言，教會不僅僅是一個有機和有生命的團體和聖統的組織，在一切之上，「她是在旅途中走向天主的子民」。她是一個「福傳」和在「旅途中」的子民的特質，遠超過她是一個「制度」和「組織」。基於他這樣的一個教會觀，故此，他反對任何形式和過份的「神職主義」（EG 102）、他重視平信徒、婦女（EG 103-104）、青年（EG 108）。

方濟各的教會觀使到他十分重視教會的「集體信仰意識」（*sensus fidei*）。¹⁰ 十九世紀的偉人紐曼樞機（John Henry Newman）曾非常強調此點，而梵二大公會議也在《教會憲章》（*Lumen Gentium*）第 12 號裡使之復甦和更新。教宗在秉持教會的教義之餘，也很重視教會內的「集體信仰超性意識」，他也盼望刷新這份久被淡忘，而由梵二再度使之復甦的教會特質。這種特質來自聖神臨在於教會內，使教會在信仰的真理上不能錯，梵二說：

幾時『從主教們直到最後一位信友』，對信仰及道德問題，表示其普遍的同意，就等於靠著全體教民的信德的超性意識，而流露這一〔不能錯誤的〕特質。天主的子民，靠著這種由真理之神所

9 參閱《福音的喜樂》，180、184、190、219等號。

10 在《福音的喜樂》的中譯本裡譯為「信仰的超性意識」。

啟發維持的信仰意識，在教會的訓導當局領導之下，拳拳服膺，其所接受者，已不是人的語言，而是真天主之言……。¹¹

總而言之，為教宗方濟各看來，教會首先是「旅途中的天主子民」。就好像天主是旅程中的天主，祂耐心地陪伴人走救恩的道路，同樣，教會也是在「道路上」、在「旅途中」；當論到教會時，「道路」(way)和「旅程」(journey)是教宗喜愛的主題之一。天主的子民是無疆無界的，臨在於每個人民之中，她的任務就是：耐心地、明智地、慈悲地「陪伴」人民和老百姓走那在救恩中成長的路程。¹²

3 教會是慈悲的母親

教宗的另一個有關教會的圖像是：「慈悲的母親」，她常抱著開放的胸懷。教會是「慈悲的母親」的思想，可追溯到公元第三世紀初的殉道教父聖西彼廉(St. Cyprian of Carthage)身上。當西彼廉與 Novatian¹³ 爭論時，後者主張教會是一個「聖潔的貞女」。為相反這異端的嚴格主張，聖人主張要慈悲寬仁對待在教難中表現出軟弱和跌倒的信徒(lapsi)。

11 參閱《教會憲章》，12號。

12 《教會憲章》，23-24號。

13 Novatian (c. 200-258)，是一位著名的神學家和作者，是第一位應用拉丁文的神學家。他對背教者欲回歸教會的態度甚為嚴苛。他的理論(Novatianism)被視為異端，並被開除教籍。

教宗發揮了多位教父的思想（例如：聖安博、亞歷山大里亞的濟利祿等），描寫教會是「一個心靈敞開的慈母」，這可清楚見於《福音的喜樂》¹⁴之中。在教宗方濟各的慈母教會身上，具有幾個與別不同的特色。

第一：走出去、走到人群中、聆聽：「（教會）自己走出去，為接觸他人甚至去到邊區，此舉並不意味著毫無目的地走進世界…很多時候，寧可拖慢步伐，切勿心急，好能觀察和聆聽他人…。」（EG 46）

第二：門庭大開、不設防：「…但教會不是關防，而是天父的家，那裡總有容人之處，不管他們身上帶著甚麼包袱。」（EG 47）

第三：先走向窮人、那些不能回報的人：「…教會必需走向每個人，無一例外。但誰是她應該最先走向的呢？…那些不能回報你的人，首先是窮人和病人，那些經常被輕視或遺忘的人。」（EG 48）

第四：不固步自封、不只求安全：「我寧願要一個走到大街上歷經波折連連、因而傷痕累累和骯髒兮兮的教會，卻不喜歡一個由於固步自封、只顧安全而抱病的教會…。」（EG 49）

根據 W. Kasper 的看法，教宗的教會觀，為他某些牧民上的做法，打下了理論的基礎，例如：在審視了其個別情況之後，允許離婚而再婚的信徒領受聖體和修和

14 參閱《福音的喜樂》，46-49、139號。

聖事…等。當教宗方濟各談到聖事時，他視聖事不但是為成全的人，更是軟弱者的滋養和良藥。¹⁵

為教宗方濟各而言，「慈悲」是福音的中心訊息，早在他做阿根廷主教時，他主教的徽號上的格言就是「因著慈悲，祂揀選了我」（*miserando et eligendo*）。自他就任教宗之職以來，「慈悲」的概念不斷出現在他的演辭和文憲中，例如，在 2013 年所發表的宗座勸諭《福音的喜樂》裡，他就多處提到慈悲。¹⁶

論到「慈悲」的主題，現任教宗並不是第一個去發揮此課題的人，在他以前，許多聖人和教宗都曾論到慈悲，例如：聖女加大肋納、聖女小德蘭。又例如：教宗若望廿三世在梵二大公會議開幕時（1962），他說：慈悲是最美麗的德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不僅談到慈悲，並將傅天娜修女封為聖人；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天主是愛》的通諭中，也都曾討論過慈悲。教宗方濟各一方面承接著前人的傳統，而另一方面卻以「創新的形式」把慈悲在牧民層面上大為發揮。他在 2013 年 7 月 25 日曾對一群青年說：「…你們行動要依據兩件事，就是『真福八端』和『瑪竇福音第二十五章』，…我請你們由心底去實踐它！」

除了 2013 年的宗座勸諭之外，教宗更在 2015 年頒布了「慈悲特殊禧年」，而慈悲的思想貫穿著整部「詔

15 《福音的喜樂》，47號。

16 《福音的喜樂》，3、11、37、43號。

書」。¹⁷ 他以「如同天父一樣慈悲」（路 6：36）作為這特殊禧年的口號。為教宗看來，慈悲並非懦弱，而是推動人打開心扉的一股力量，因為，*misericordia* 就是指：具有一顆慈悲憐憫（窮人）的心。慈悲是天主臨在的標記。教會應是慈悲的，並以慈悲的心去服務人群。「慈悲」可說是他的關鍵字。他說：「在人與人之間，小小的慈憫，可以改變世界」。有人懷疑教宗所講的「慈悲」是一種「懦弱」、是「在牧民上的放任」、是叫人做「減價」的基督徒。慈悲就像一種「柔順劑」，軟化了、甚至埋沒了教義，和廢除了真理的核心和基本意義。教宗認為，這就是在福音中法利塞人對耶穌的指責。耶穌的慈悲激怒他們，令他們起殺機。

對教宗來說，慈悲是啟示的基本真理，是耶穌所提出最具挑戰性和最有要求的誡命。慈悲不消除正義，而是超越它，它是更高層次的正義。因為，沒有它，無人可以進入天國。在神學上把「慈悲」和「正義」對立起來是無聊之舉。相反，慈悲是天主最基本的屬性，是諸德之冠。教宗對慈悲與正義的關係，在《福音的喜樂》和《慈悲面容—慈悲特殊禧年詔書》裡，都解釋得很詳細。¹⁸

教宗強調「慈悲」是對神學引進了思維上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為神學打開了新視野。他的神學思維方式不是「演繹性」的，而是「歸納性」的。

17 教宗方濟各，《慈悲面容—慈悲特殊禧年詔書》，2015。

18 參閱《福音的喜樂》，37號；《慈悲面容》，20-21號。並請參閱 Pope Francis, *The Church of Mercy: A Vision of the Church* (Chicago: Loyola Press, 2014), pp. 3-6.

他的方式是：seeing, judging, acting. 首先第一步是歸納所見所聞，其後才引進神學的反思準繩。這種「範式轉移」是打開了神學的視野，進入另一個角度和層面去看事物。他認為：若能從慈悲的角度去反思一切與神有關的問題，則神學的視野會伸展得更深更闊！

方濟各的改革方向

早在阿帕雷西達的會議中，方濟各已明白到，面對教會目前的處境，只講個人「內在的悔改」是不足夠的，必需關注到「整個教會生活模式和作風」的改變，而「架構和建制」上的改革，亦屬必需。因此，談到教會的革新，必需包含三大層面，就是：心態上、架構和建制上、以及牧民上的革新。

1 心態上

所謂心態 (mind-set) 的革新，亦包括「生活模式」和「作風」的改變。早在 2008 年，當他對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司鐸議會講話時，他清楚地指出：「革新首在心態的轉變」。他非常強調「心態」的革新，認為應把精神置於法律之先，而傳教的精神勝於「僵硬嚴苛」的教條。

在他就任教宗之初，他便要扭轉潛在於教會內的某些俗化的心態。他堅守一貫以來簡樸而又平民化的風格，他這種簡樸親民的作風，已深入人心。然而，其中最令教會（包括基督教各宗派）觸目的事件，就是他一開始便自稱為「羅馬主教」。這樣的稱呼，不論對天主教內

或教外人士都別具意義。伯多祿繼承人身上「羅馬主教」的名銜，相當古老，可追溯到公元第二世紀初的教父安提約基雅的依納爵 (Ignatius of Antioch) 身上。這位影響力非凡的教父，曾描寫羅馬教會的首席地位是：在「愛德中的首席」(Primacy-in-love/in charity)。這樣的稱呼，不僅暗示一如教父所主張，教宗自視為長兄，與各地方教會的主教的關係有如手足，是兄弟共融的中心；另外，這樣的稱呼，對合一交談來看，也大為降低了歷來對教宗身上「首席權」性質的爭議，尤其是梵一對此權力在法律上的註釋和界定。他清楚顯示出他身上的首席權主要是為服務、為維護教會的共融合一。

為教宗看來，改革首在心的轉化，若心態轉變，則態度、作風和視野都會改變。

2 架構與建制上

「C9」的新架構：在教會的管治架構上，教宗方濟各為了實踐梵二大公會議所提倡的「集體領導、擴闊參與」的精神，他在就任不久，便成立了所謂 C8 的委員會 (committee)。這個組織，由來自全球各大洲的八位樞機所組成，稍後，又改稱為 C9，因為加入了國務院的成員。這個組織，主要是協助教宗進行教會的改革（包括改革教廷），制定工作的優次準則，並繼續推進梵二大公會議未完成的某些重要事項。

世界主教會議：在普世教會的治理上，教宗方濟各渴望積極落實梵二的 collegiality（集體領導、共負責任）

的精神。¹⁹ 他努力加強由教宗保祿六世所建立的「世界主教會議」(World Synod of Bishops)，他認為，這個架構很能夠表達出教會普世共融的面貌，亦可實現教會「至公性」(unity-in-diversity)的特質，故此，極需加強這個架構和組織的角色與身份，而目前只是在開步階段。

主教團：在梵二大公會議中，教長們曾爭論：主教團(Bishops' Conference)這二十世紀新興的「架構」是否可稱為教會 collegiality 的具體表達？當時，有一派人的意見是：絕對不可以，因主教團的組織缺少了普世教會之首的因素存在，與「世界主教會議」(World Synod of Bishops)相比，它更次之，只有教會中的「大公會議」(Ecumenical Council)是 collegiality 的正式具體表達。另一派主張：主教團應當是 collegiality 的「局部」表達，這一派人士當中有著名的神學家在內，包括：Karl Rahner 等。最後，由於爭論無法立即解決，故此，當時的神學委員會，只好在草案內用了一個較不具爭議而又可包容兩者意見的字眼，就是 collegiate spirit，意即：主教團是 collegiate spirit 的具體表達。²⁰ 大公會議之後，開放派的神學家繼續為主教團的地位護航，著文立論，促請教會方面給予主教團更大的自主權；而另一派則掛慮教宗的至高權力會被削弱而力保教會的傳統結構不受動搖。

在 1988 至 89 年間，羅馬信理部與主教部合作頒發了有關《主教團在法律與神學上的地位》的工作文件。

19 參閱《教會憲章》，22號。

20 《教會憲章》，23號。

當這文件送到不同的主教團和神學家手上時，引發不可遏止的爭論。開放派認為，這文件有「倒退」的趨向，並認為文件對「共融」的概念不清楚，頗為偏離梵二大公會議的路向，有些主教團亦有強烈反應。最後，這工作文件並未成為正式的訓導文件；稍後在 1992 年 5 月 28 日，信理部另外頒發了一個官方文件，題目是：《從共融的觀點看教會》，²¹ 並針對 collegiality 的思想來討論。這份文件被視為是討論主教團在神學與法律地位的前奏和預備。當時，信理部部長是賴辛格樞機 (Cardinal Joseph Ratzinger)。但，後來賴辛格成為了教宗本篤十六世，而這個問題也不了了之。現在，方濟各教宗重提主教團的問題，在《福音的喜樂》中，他清楚地說，主教團應擁有更多的職權和更詳明的法定地位。²²

地方教會：當論到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關係時，他主張給予地方教會更多自主的空間。²³ 教宗亦提到堂區和各種基層團體的更新，堂區具有強大的靈活性，它應是以傳教為重的團體。²⁴

改革教廷：近代多位教宗上任後，都曾對教廷進行改革，但卻少有教宗對教廷如此直率地批判。當談到改革教廷時，我們都被教宗方濟各那一針見血、毫不留情

21 信理部致天主教主教函，《從共融的觀點看教會》(台北：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秘書處出版，2002)。本文件由信理部於 1992 年 5 月 28 日頒發，而中譯本在 2002 年在台灣出版。

22 參閱《福音的喜樂》，32 號。

23 《福音的喜樂》，30 號。

24 《福音的喜樂》，28-29 號。

的批判所震攝。教宗方濟各列數教廷的十五項毛病，²⁵ 其中包括：沉迷於世俗利益和權力的「心靈癡呆症」、貪腐、管理不善、自以為是、勾心鬥角、忘記要服侍人群、言行不一等等。他強調，教廷若不能自我批判，趕上時代，不想追求進步，就是病了。在另一個場合裡，他又討論到服務教會所不能或缺的十二項德行。²⁶ 若用英文來看，並把這十二個德行的頭一個字母拼合起來，就是「慈悲」的拉丁字“*misericordia*”。這些德行包括：

Missionary and pastoral spirit	(傳教及牧民精神)
Idoneity (or suitability) and sagacity	(中肯和睿智)
Spirituality and humanity	(靈修和人道)
Example and fidelity	(榜樣和忠誠)
Reasonableness and gentleness	(合理和溫文)
Innocuousness and determination	(不存惡意和堅定果斷)
Charity and truth	(愛德和真理)
Openness and maturity	(開放和成熟)
Respectfulness and humility	(尊重和謙卑)
Diligence and attentiveness	(勤懇和專注)
Intrepidness alertness	(果敢和敏銳)
Accountability and sobriety	(負責和持重)

所以，*Misericordia* (慈悲) 是諸德之冠！

25 請參閱 Rocco D' Ambrosio, *Will Pope Francis Pull It Off?: The challenge of Church Reform* (Minnesota: Liturgical Press, 2017), pp. 43-51.

26 *Ibid.* p. 73.

3 牧民上

3.1 以窮人為優先 (EG 197-201)

教宗方濟各改革教會的目標之一，是為達到一個「為窮人的貧窮教會」。這也是他取名為方濟各的目的。「貧窮教會」雖然並非梵二大公會議所討論的主要課題，但它曾出現在《教會憲章》²⁷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²⁸之中；而教宗若望廿三世在1962年9月也曾談到此課題。教宗方濟各認為：貧窮並不是一種自然的命運，而是「失衡和顛倒的經濟制度」所帶來的後果。金錢變成一切的中心，它決定一切，亦由此產生消費主義，把人貶抑為「經濟動物」，方濟各明顯對拜金主義的社會現象說「不」。²⁹教會在今日世界中，面對很多的挑戰，譬如：難民、維護生命、家庭危機、資訊發達而帶來人迷失方向、價值觀改變、俗世主義和相對主義…等等。在眾多的挑戰之中，教宗方濟各特別關注社會上的貧窮問題。³⁰他認為，貧窮是眾多問題下所隱藏著的最關鍵問題。

教宗方濟各所說的「窮人教會」(The Poor Church)，特別是指向：教會作為一個人間機構的表現，尤其是她在處理現世財物與金錢的態度上。他大力批判教會內「貪腐」的弊病，認為「貪腐」最牴觸神貧之德。

27 參閱《教會憲章》，8、3號。

28 參閱《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1號。

29 參閱《福音的喜樂》，52-55號。

30 《福音的喜樂》，52、60-67號、第四章。

教會要抵抗拉人向下的力量，在福音中汲取精神的動力。貧窮的教會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天主的眷顧上，並因此而充滿福音的喜樂。教會在天主和人面前，應表現出這種神貧精神。³¹

對於教宗方濟各所說的：教會應成為「為窮人的貧窮教會」(The Poor Church for the Poor)的思想，有人質疑：一個貧窮的教會如何可能去幫助窮人？教會不是依靠許多醫院、學校、安老院等等福利機構去實踐福傳和助人嗎？教宗的回答是：最重要是這些機構的存在不是為教會本身，而是真正地為近人。所以，在財政和行政的運作上應極力提高其透明度。教宗認為，梵二大公會議之後的改革，多集中在禮儀和架構上，現在，他邀請教會走出去、走到貧窮和邊沿人士中間，走進新的社會和文化圈子中。

3.2 關注弱勢社群

教宗提醒人，耶穌是最出類拔萃的福傳者，祂卻以弱小者自居（瑪 25：40）。我們蒙召是為照顧世上脆弱的一群，教會應靠近新形式的貧窮，投放更多的資源去幫助弱勢的群體。³² 這些群體包括：流浪者、癮君子、難民、土著、遭遺棄的長者、移民、遭受排斥和暴力的婦女、未出生的孩子，以及所有弱小及沒有能力自衛的人…等。在此，教宗又提到大自然，我們作為受造物的管理者，也應保護整個受造界不會被剝削和被摧殘。³³

31 《福音的喜樂》，198號。

32 《福音的喜樂》，209-216號。

33 《福音的喜樂》，215-216號。

3.3 合一勝於衝突

在討論到梵蒂岡與中國簽署《臨時協議》的問題上，也許，教宗方濟各對衝突和合一的看法和原則，有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他的行動，他強調他的關注是以牧民為主。在《福音的喜樂》第 226 至 230 號，教宗十分清晰地表達他對衝突和合一的看法。他認為最好解決衝突的方式，就是：「甘心情願面對迎面的衝突，解決衝突，讓衝突成為新進程這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他又表示，在處理衝突時，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原則，就是：合一勝過衝突。所謂合一，「不是選擇一種混合主義，亦非選擇一方吞滅另一方，而是選擇在更高的層次上化解衝突，凡是對雙方有效和有用的，都須保留。」另外，他又提到「和平」，它「不是談判後的和解協定，而是信念，相信聖神帶來的合一，能使每個分歧和諧共存」。

結語

教宗方濟各對教會的改革，包含幾個目標：首先當然是「為窮人的貧窮教會」，聆聽的教會，走出去、走到邊沿處境的教會，對話的教會，真正傳教的教會，慈悲的教會…等。最後，讓我們用他的一句話作結束：「…教會必需成為慈恩白白地分施的地方，在那裡，人人都覺得被接納，被愛，都可得到寬恕和鼓勵，因而按著福音，善度新生」。³⁴

34 《福音的喜樂》，114號。

